

读史阅世

平和窑与月港的世界陶瓷之路

□王毅霖



明平和窑五彩双龙双凤花卉纹折沿大盘



明平和窑青花光山水楼阁纹大盘



平和博物馆馆藏

月港位于九龙江入海处,因九龙江之海澄月溪至海门岛江道段的地形“一水中蛭,环绕如履月”而得名。这里河海交接,交通便捷而几无风浪,是适宜的入货登船之处。后来月港泛指整个九龙江流域,许多国外文献又称之为漳州河。

作为福建省第二大河流,九龙江包含了北溪、西溪和南溪三部分,流经漳平、华安、长泰、龙海等8个县市,在入海口与漳浦、云霄、东山等县的多个港口形成一个港口链,并以入海口镇海卫太武山为坐标,成为明代许多国际海洋航路的起点。

月港的兴起

月港海洋贸易的兴起,要早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上百年。

根据清乾隆年间的《海澄县志》载,早在明正德、嘉庆年间(1436—1456年),这里的民众已“多货番且善盗”,到了明成化、弘治年间,已然发展到“人烟辐辏,商贾咸集”的程度,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云:“时漳州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海道不靖。”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亦云:“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观海外者。”其他诸多文献资料也证明了月港在开禁之前,海洋贸易所形成的繁华景象已有上百年,这里一度被称为“小苏杭”。

隆庆开禁,月港成为明代唯一准贩东西洋的官方港口,更使海洋贸易得到空前的发展。《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漳泉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九龙江冲积而成的漳州平原是福建省最大的平原,被誉为“鱼米花果之乡”。事实上,在明清以前,九龙江入海口一带农业生产条件极差,《东西洋考》载:“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役,固得租税归来;贫者为佣,亦得升米自给。”彼时全漳的农业和手工业几乎都围绕着海洋贸易所带动的产业而进行,正如萧基在《东西洋考》的小引中所描绘的景象:“澄、水国也。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共,酬酢之皆夷产。”

月港海洋贸易中,主要输出货物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铁器等,其中瓷器一直是最大宗的货物之一。有学者根据国外相关的档案资料统计认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

建立到康熙三十四年(1602—1695年)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约二千万件”,可见数量之庞大。如果加上其他贸易公司、航道,以及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地,数量上将难以想象的难以想象的程度。

平和窑的兴衰

尽管明清时期九龙江各支流和干流沿岸多有窑场,分布最为密集、生产数量最大且主要生产当时出口量最大的青花瓷者则当数平和窑。

平和窑从明中期才开始兴起,许多地方志的梳理明晰了这一过程。明正德《漳州府志》关于瓷器的记载为:“白瓷,出漳平永福里。黑瓷器,出南靖河头。青瓷器,出南靖金山。”明万历年元(1573年)《漳州府志》则记载为:“瓷器出漳平、平和等县。”可见此时平和窑已经渐起。而明万历癸丑(1613年)《漳州府志》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他邑,然亦不甚工巧。”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平和县志》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隔。”显然,这是一个从明中期到清晚期,由无到有,由粗到精细的发展过程。

根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物普查和考古挖掘,平和县境内明清窑场多达数十处,基本遍布全县各乡镇,其中以南胜、五寨最为密集。重要的窑地包括南胜镇花仔楼、田坑、五寨乡大垵、二垵窑等。出土的瓷器包含青花、青瓷、白瓷、酱釉、彩绘瓷、素三彩等,其中以青花、彩绘瓷和素三彩数量最大和最具独特性。

平和窑的崛起,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明万历年间,景德镇矿土日益匮乏,以及窑工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所造成的动乱。许多窑工因此远走他乡另谋出路,成为工艺传播和转移的巨大推力。二是月港的崛起,跨国海洋贸易对于陶瓷产品的大量需求,是促进这一行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三是平和县特殊的历史人文与地理因素。根据清道光《平和县志》载,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历任44位知县中,除一位籍贯未详外,江西籍有14位,如果加上其他江西籍的各级官员,甚至追溯到平和公认的创县之父江西人王阳明,平和县与江西可谓是渊源深厚。如此的人脉相连与文气相承,许多窑工在重新选择生产与生存之地时,平和县自然成为一个

好地方。盘绕流经平和大部分乡镇的九龙江支流花山溪,使得这里水路交通便捷;平和山区大量的木材可供烧窑所用;这里工价低廉,有利于这一行业大量生产。随着月港兴起,诸多因素使得平和县成为最佳陶瓷生产地。

平和窑的身份认定

从外在形式来看,以青花瓷为主的平和窑工艺辨识度最高。最为突出的是,由于釉料提纯工艺过于粗糙,青花颜色灰暗且多带有晕散的特征;其次,由于圈足修整上少了“倒角”这一道工序,加上烧制过程中简单以砂层代替饼垫所形成的沙足口。

其他还包括胎体粗糙疏松、胎质色泽发灰以及纹饰潦草写意等,都成为今天考辨平和窑的重要依据。究其原因,主要是民窑工艺的自由度与海洋商贸时间对市场的巨大需求所致。

由于产地归属长期不明,平和窑在历史上拥有许多名字。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由于市场的争夺,先后掠获两艘葡萄牙克拉克商船,并把这两艘商船上满载的中国青花瓷器运到荷兰的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拍卖,这些瓷器因此被称为“克拉克瓷”并延续下来,用以指称明清时期的中国陶瓷。彼时运往欧洲的陶瓷包括漳州平和窑、漳州东溪窑、景德镇与德化陶瓷。可以说,克拉克瓷泛指所有明清的中国瓷。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在平和窑尚未进入学术视野之前,因这些瓷器多经由汕头出口,国外学者称之为“汕头器”。“交趾烧”或“交趾盒”,则是日本人误以为平和窑的素三彩香盒来自交趾。平和窑的素三彩香盒还销售到东南亚和欧洲各国,这些地区又把这种产地不明的陶瓷品种称之为“华南三彩”。“沙足器”也是因为早期平和窑的产地不明,而对其烧制工艺所形成沙足圈底陶瓷的称呼。日本人还把平和窑青花光大盘称为“芙蓉手”,谓平和窑五彩瓷为“吴须赤绘”。

关于平和窑的命名问题,上世纪90年代,许多本土专家曾经聚集一起探讨,最终以九龙江流域为统摄,把明清的漳州窑口出产的瓷器统称为“漳州窑”。显然,这种命名太过含混。一方面,“漳州窑”包含平和窑和南靖、华安的东溪窑,尽管二者均生产多种类别的瓷器,但在工艺制作和成品样式上存

在较大的区别,前者主要是传承景德镇青花瓷和五彩瓷工艺,后者则是侧重本土传承发展起来的米黄釉瓷;前者器皿多以碗盘为主,后者则常见仿古器形;前者图简单便捷,多形成沙足口,后者工艺较为讲究,少见沙足,并多见玉璧足。

另一方面,统称为“漳州窑”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平和窑因月港而兴、因月港而衰的历史文化特性。平和窑与月港商贾的紧密关联,甚至可以认为,海洋商贸所带来的工艺特性就是其文化价值上最为重要的属性。

月港的世界陶瓷路

在早于西班牙殖民菲律宾并开放马尼拉港的100多年前,甚至早于1521年麦哲伦到达菲律宾的近80年,福建人已通过月港与东南亚各国进行“通易货物”。

从月港开禁前100多年前开始,闽人通过月港往来商贸的国家就有数十个,据《东西洋考》所载,包括吕宋、苏禄、文莱等“东洋列国”,交趾、占城、暹罗等“西洋列国”,以及日本、朝鲜和红毛番(欧洲各国)。

月港的世界陶瓷路,除了往南与东南亚各国直接贸易的航线,往北与日韩的贸易航线外,最为显著的航线有两条。其一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航线,这条航线于1565年由修士航海家马尔达内塔所开创,是一条从菲律宾马尼拉横跨太平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新航道。由于贸易所用的船只均为中国工匠在马尼拉建造的大帆船,这条新航线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1573年起,这条航线成为沟通中国、马尼拉、美洲并最终通往欧洲的贸易全球贸易航路,开启了一个“白银化”的时代。

另一条则是延续宋元时期的海上陶瓷之路,由欧洲人通过印度洋抵达东南亚,甚至直接到达中国东南沿海,满载中国陶瓷等货物运往印度、西亚、非洲与欧洲各国。今天,在东南亚、非洲、欧洲和欧洲各地的博物馆以及沉船打捞的明清瓷器中,平和窑的“沙足器”依旧最为常见。

作为明清时期全球文化与贸易往来中重要的交汇点,月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标识之地,也是明清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桥头堡。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

史海钩沉



“海澄邑侯兼摄龙溪县事陈公惠民德政碑记”是龙溪县衙的唯一遗存。 本报记者 萧镇平 摄

陈世仪德政碑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刘钦赐

在漳州市龙溪县的龙溪遗址公园,一块“海澄邑侯兼摄龙溪县事陈公惠民德政碑记”讲述了一位勤政爱民的好知县陈世仪。龙溪县和海澄县都是福建省旧地名,属漳州府。

其中,龙溪县为漳州府的附郭县,县城即今龙溪县城;海澄县大致位于今龙海区东部以及厦门市海沧区除东孚街道以外的区域,县治为龙海区海澄镇。1951年6月,析龙溪县城关一区、二区设县级漳州市(今龙溪城区)。1960年,龙溪县与海澄县合并,以两县各取一字得名龙海县,县治石码镇。

龙溪遗址公园这块德政碑的主人就是陈世仪,字仰之,浙江海宁人,监生,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任海澄县知县。清乾隆版《海澄县志》记载其“貌颀而髯,精明强干,锐意兴除”。一般县志在记载地方官员时很少描述外貌,这说明陈世仪确实长得很高大,仪表出众。

清乾隆版《海澄县志》还记载,陈世仪千里迢迢从浙江海宁赶到福建就任,风尘仆仆,初到海澄时,就立刻下马车,向百姓询问民情,当得知有官兵和豪绅占据沿海一片的蛭埋网桁时,十分愤怒,判令将占据的蛭埋网桁全部退还给百姓,以利渔业发展。

陈世仪上任后,通过暗访得知,驻扎本地的清军占据浮宫等渡口,向过往平民、商贩强索过路费,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他便带着随从乔装成普通百姓,乘轿过渡,清军士卒果然蛮横索要,甚至要砸碎轿子。此时,陈世仪从轿中出来,命随从拿下清军士卒,捕送帅府治罪,主帅在确凿证据面前无法辩护,恼怒之下撤回所有关卡,当地百姓由此摆脱一道沉重负担。自此,陈世仪名声传遍漳南一带。

陈世仪在海澄知县任上7年,“政治人和,颂声四溢。自制府以下,刺史、观察以上,皆廉其才品也”。能者多劳,此后朝廷又命他兼摄龙岩知县,过了3年,又兼摄龙溪知县。陈世仪一人挂三个县的知县,这是全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龙溪遗址公园位于闽南师范大学边上的“百里弦歌”,陈世仪德政碑建在一座亭子里,碑亭与石碑均为南北向,花岗岩材质,碑身高303厘米,宽113厘米,厚16厘米,碑座尚埋于土中。碑亭为四角,方柱,重檐歇山顶,飞檐翘角,正脊居中置葫芦。

陈世仪德政碑全文共1467字,正文776字,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孟冬立,此时陈世仪到福建上任已满10年。碑文记载陈世仪治理龙溪县的卓然政绩,由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龙岩白沙人吴相撰文,赐进士出身、内閣中书、海澄人郑亦孙书丹;赐进士第、知四川重庆府綦江县事、龙溪人蔡日光篆额。

文末附士民题名196人,其身份有举人、贡生、监生、生员、里班、乡宾等,如包含碑记作者、书写者在内,共有199名,其中有进士8人、举人24人,任官者28人,府县志中载有传记者26人。当时龙溪、海澄的社会贤达多名名列其中,其中就包括著名华侨郭居昌、郭居鼎兄弟。

郭居鼎,字籍侯,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出生于海澄五都圳晚社(今龙海浮宫镇霞村)。十五六岁时,通过月港只身下南洋到爪哇谋生,经过多年打拼,终成为富商巨贾,在三宝壟及巴达维亚先后被荷印当局任命为雷珍兰、甲必丹等职,在当地华人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后归国回乡,花钱向朝廷捐了一个闲官,以耀门楣。郭居鼎情系桑梓,乐善好施,带头捐资兴建溪溪码头、建筑海岸、建设浮宫码头,闻名乡里。

清乾隆版《海澄县志》记载,知县陈世仪将清军占据浮宫等渡口整治后,为了方便百姓过江,“邑绅郭居鼎与居昌议设义渡二只以济往来,捐资四百五十两置田,以给舵工修船之费”。

“郭居鼎、郭居昌与陈世仪结下深厚友谊。后来陈世仪兼龙溪县要修新桥时,郭居鼎、郭居昌兄弟就过来捐款共建。”漳州市龙溪区政协文史办主任许江鸿说。漳州九龙江上原有一座木桥,始建于明朝,称为文昌桥,清朝时称为新桥,桥中建亭,桥北建文昌阁,桥南建观海楼,为当时漳城诗坛胜地。在历史上,此桥曾多次损毁,也曾多次重修。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桥面又毁坏时,就是由郭居鼎带头重修的。清光绪版《漳州府志》在郭居鼎的传中有段记载:“漳郡新桥圯,捐修筑。金曰:必郭籍侯。”而陈世仪对郭居鼎的评价为“鼎雄于财,思为德于乡”。

陈世仪来自浙江海宁陈氏望族。在清一朝,海宁陈氏十三世科第连绵不断,先后31人进士及第,107人中举、秀才442人,有“海内第一望族”“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美誉。

海宁陈氏最令世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乾隆的身世之谜。民间传说,乾隆原本是陈阁老的儿子,这个陈阁老就是海宁的陈世仪。乾隆江南,4次住在了陈阁老家里,其目的就是为了去探望亲生父母。同为海宁人的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他的著作《书剑恩仇录》里就讲述了这段传说。当然,“乾隆是陈阁老儿子”是野史,不可当作历史事实来相信。

而陈世仪正是陈世仪的堂兄弟,海宁当地史志记载,陈世仪的祖父陈之问和陈世仪的祖父陈之周是亲兄弟。陈世仪出自名门望族,在海澄知县任上长达13年,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得到官民一致的称颂,以至地方乡绅和百姓都自发为其树碑立传。“全市颂扬陈世仪的德政碑共有4块,除了龙溪遗址公园里的这块碑外,还有3块都在龙海区。”许江鸿说。

龙溪现在已成为历史名词,有关龙溪县的文化符号日渐消逝,所存无几,而“陈世仪德政碑”成为龙溪县衙唯一的史迹,故显珍贵。

乡土琐记

中国海拔最低的寺庙——东山东明寺

□孙群 文/图

东明寺坐落于漳州市东山东明寺,建于明代,号称是全国海拔最低的寺庙,犹如海外佛国。明嘉靖五年(1526年),巡海道蔡潮在东山山顶建文峰塔时,见东明寺上空祥云瑞彩,故此称此地为“佛澳”。

东明寺位于东山东明寺古城东门外外的海面上,又名塔屿,是我国四大名屿之一,岛上奇峰怪石,泉水清澈,树木郁郁葱葱,冬暖夏凉,气候良好,犹如蓬莱仙岛。俯瞰东明寺,但见其有飞龙在天之势,又如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具龙飞凤舞之吉兆。东明寺就在东明屿北部的佛澳,浸月湾的北面,坐落北朝西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海。

寺庙面向浸月湾,海湾的风浪比外海小,能避免风浪的侵犯,数百年来,无数次海啸和暴风雨来袭,庙宇却基本安然无恙。东明寺的东、南、北三面均为山峦,正好把庙宇围起来,可免遭夏季台风和冬季寒风的侵袭。寺庙山门直接面对浸月湾,正好形成一个风水上的气口,视野极为开阔。这里是远

离城镇的孤岛,与世隔绝,古人迹罕至。

由于东明屿礁石众多,少有平地,因此东明寺除了中轴线上几座主体建筑外,其他殿堂分布较为零散,为主轴对称结合自由布局,建筑面积8500多平方米。中轴线从低往高依次为石塔、天王殿、大雄宝殿、大圆通殿,东侧有伽蓝殿、三官亭、地藏王殿、五观堂等,西侧为唱云堂、藏经阁、僧寮等。寺庙西南面为南山门、佛澳码头、卧佛坛,东南面有东山门、佛澳塔、普同塔。天王殿前面就是大海,海对面山上建有文峰塔。东明寺高低错落的殿堂楼阁之间,修有许多崎岖不平、四通八达的石阶与通道,把建筑与景观连接起来。

南山门位于佛澳码头之上,为三间八柱三棱式石牌坊,歇山顶,屋顶饰剪粘。大门匾额书“东海明珠”,内柱隶书楹联“临济高风入天宏范,禅净无垢转妙法轮”,外柱篆书楹联“千顷汪洋随济度,二门清静绝法尘”。东山门位于佛澳东侧山坡,为三间八柱三棱式石牌坊,歇山顶,屋顶饰剪粘。门额前匾额刻

“东明圣刹”,背面匾额刻“中流佛心”。

卧佛坛为圆形建筑,重檐圆形攒尖顶,刹顶立宝珠。正面开门,其余辟空窗,大门石刻楹联“即庄严离尘当下便登宝地,非相好各相好现前顿见如来”,由于卧佛坛是东山山门入寺第一座宝殿,读罢此联,仿佛顿入佛境。坛内佛龛上方嵌木雕二龙戏珠,龛上匾额书“莲花佛国”,两侧楹联“法典弘开援众生在尘劳海上,心悟缘悟诸佛于大光明中”。

天王殿具“皇宫气”建筑特色,歇山顶,正脊两端雕孔雀开屏,垂脊牌头雕坐佛、观音、罗汉,翼角饰麒麟与卷草纹。外檐柱楹联“潮水长流摧浪浪碧海,高山仰止寄目望文峰”,指出天王殿直接面对着浸月湾,并能望见海湾对面山巅的文峰塔。

大雄宝殿地势渐高,正面设石阶,依山临海,气势恢宏。重檐歇山顶,正脊脊刹置法轮,两端雕孔雀开屏,脊塔浮雕三条行龙。外檐柱楹联“悟得檀那寻香乃真供养,了知灯即是火归大光明”。上檐下方施一排一跳斗拱,雀替木透雕丹凤牡丹,随梁枋、牵牵木雕荷花、缠枝花卉、蝙蝠、螭龙等,梁枋上彩画罗汉、花鸟等。殿内墙壁上的每块琉璃砖上都雕有一尊佛像,共有1万尊。殿内供奉着9尊大型汉白玉佛像,两侧为汉白玉十八罗汉。

大圆通殿位于最高处,为平面八角形两层楼阁,八角攒尖顶,四周环廊,一层外廊建有阶梯通往二层。大门楹联“五觉六尘瞻仰慈尊而普度,三途八难皈依佛母以潜消”,伽蓝殿其实是座四角形凉亭,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地藏王殿为两层楼阁,虎殿顶,翼角饰卷草纹,面阔一间,藏经阁为两层楼阁,平座设花瓶式栏杆。

文峰塔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平面八角五层楼阁式实心花岗岩塔,通高14米。三层塔基,一面开拱形门,现已用条石封堵,上方塔铭刻“东屿文峰”,第二层塔身转角立两根倚柱承托塔檐,其中塔身四面雕结跏趺坐于莲花上的佛像,或结禅定印,或双手合十,另外四面素面无雕刻。层间以条石直接出檐。八角攒尖顶,塔刹为宝葫芦式。

文峰塔具有镇海保平安、兴文运和导航的功能。这里东面是漳浦县的古雷半岛,从东海进入东山湾的船舶都需经过东明屿与古雷半岛之间的航道。这个航道除了东明屿之外,还有树尾屿、水岩屿、虎屿、大坪屿和铁钉屿等众多小岛,海域复杂。明代福建巡海道蔡潮来到东山视察时,发现东明屿附近的海面海浪较大,岛屿较多,不利于过往船只,于是在山上建塔,为船舶导航。

东明寺最大特色是其极低的海拔,最低处仅0.6米,几乎接近海面。站在天王殿前的石壁上,波澜壮阔的大海近在咫尺,心情顿时平静下来,有远离尘嚣之感。特别是南山门直面大海,常有惊涛拍岸之胜景。

这里虽然远离大陆,但仍有几处淡水,实属难得。如天王殿右侧有一口淡水井,名“平湖泉”;天王殿后面有一口泉眼,名“观音泉”;唱云堂边还有“白玉泉”,泉水水质良好,长年不涸。如今这三处泉井已保护起来,形成精致的小景观。东明屿植被良好,有相思树、木麻黄、柠檬桉、湿地松等,以防风防沙和抗碱树种为主,寺庙前后还种植有凤凰木、波罗蜜、佛肚竹、柏树、金边黄杨、龙眼等。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东明寺